

第9期

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三十日出版

口述歷史

吳大猷題



口述歷史 第九期

編輯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11529

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電話／(02)27898268 • 27898281

傳真／(02)27861675

劃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購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27898208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054251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定 價／新台幣 200 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目 錄

訪問紀錄

- 3 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李毓澍 紀錄／周道瞻
- 86 邵百昌先生訪問紀錄
校閱／郭廷以·沈雲龍 訪問／沈雲龍·陳存恭·林泉
紀錄／林泉
- 125 周合源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 紀錄／黃銘明·朱雲珍
- 150 王家儉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文堂·沈懷玉 紀錄／沈懷玉

演講

- 187 如何推動口述歷史計畫：
為中華民國護理學會推動該一計畫演講
張羽園

讀者來函

- 202 《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的部份更正和補充
王志廉
- 206 《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幾點更正和補充建議
王志廉
- 212 編後語

《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委 員 呂芳上 陳存恭 許雪姬 賴惠敏

陳儀深 張 力 黃克武 許文堂

游鑑明

執行編輯 黃克武

蔣鼎文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李毓澍

紀錄：周道瞻

時間：民國五十三年五月至五十四年十二月

地點：台北蔣公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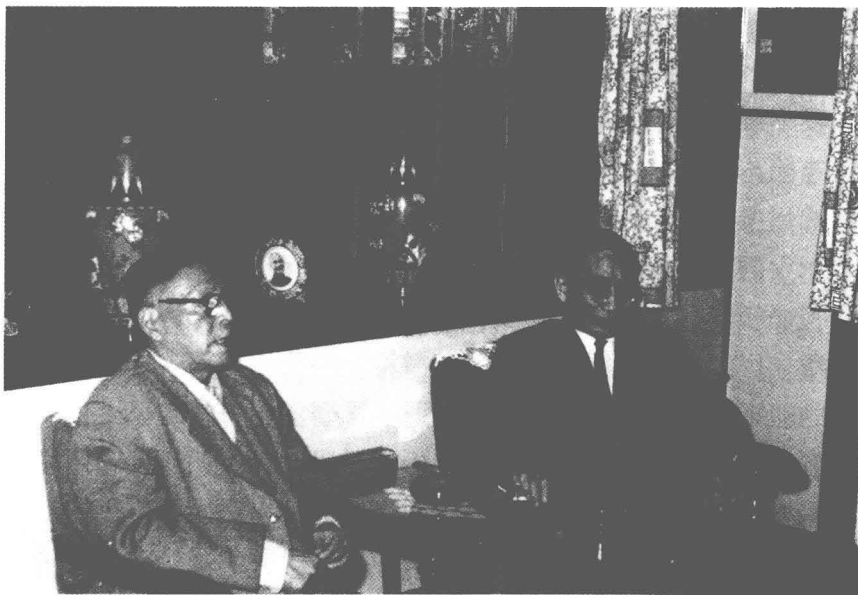
家世及教育

(光緒十九年至宣統三年，1893～1911)

我的家鄉是浙江省的諸暨縣，清代屬於紹興府，一府兩縣，另一縣便是嵊縣。這一帶人民的生活大都小康。一般人家的子弟受到中等教育，無力升學的大部份到政府機關去充當小吏，或者當訟師，所謂「紹興師爺」大致是這樣來的。我的家鄉叫盤山，說起來是一個很有名的地方，便是春秋時代的絕代美人——西施的故鄉，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古蹟供人憑弔，還有許多傳奇故事在民間流傳。這一帶民風非常純樸，風景非常優美，物產豐饒。自浙贛路建造後，地方更加繁榮。蔣家這一族是宋代平定方臘之亂時由江蘇的宜興遷來的，支族繁衍分佈在浙東一帶，有完備的家譜，記載著蔣家的譜系。我兒提時代曾隨家人到宜興去祭掃過遠祖的墳寢和展拜宗祠，至今尚能依稀記憶。

海禁開放之後，浙江省首先接觸到近代物質文明和西方的思想，在整個中國來講，可說是得風氣之先，對於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思想界有著很大的影響，佔著很重要的地位。由於地方殷富和教育發達，浙江可說是人文蔚起，國人稱之為「江浙人文薈」。蔣族中，近代出了一些名人，除了總統之外，其他尚有名軍事家蔣百里（方震）先生、蔣百器（尊簋）先生、最近逝世的蔣夢麟先生，以及總統最信任的蔣伯誠先生。伯誠先生是我的族叔，是與我最近的支族，我自己這一支在祖父時代算得上小康，到我父親千朗公時，食之者眾，生之者寡，家境便漸漸地窮困起來。我父親從小進學堂念書還是靠自己工作來籌措學費才完成自己的學業，可以想知家境的艱辛。就是因為他自己從小飽受了這種痛苦，所以後來鼓勵我上進，在我能力達到時，要我創辦地方福利事業。到我念書時，家境並未好轉，所以只能在本地念小學堂，我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出生的，九歲啓蒙，一念就念到十八歲，一共念了九年小學，那時小學沒有嚴格的學年限制，與私塾的區別不大，本來早就該到紹興府去念中學，可是到紹興念中學每年需要拿出一百二十元現大洋做學費和生活費，以當時我的家境來說，是無法負擔的，所以我在小學一直念下去，念了九年，直到光復的那一年（1912年），才進入紹興軍事學堂，開始我這一生的軍人生活。

我念的小學叫做翊忠學堂，諸暨很多的名人大半出身於翊忠學堂。校長是鄉哲吳仲懷先生，他是前清的舉人，是一位碩學之士，他受了革命思潮的薰染，很早便參加同盟會。從他對同學們談話的口中，我第一次聽到「革命」、「孫逸仙」、「檀香山」等一連串以前未曾聽過的新名詞。當時他與革命黨人時相往還，革命



蔣鼎文先生（左）與郭廷以先生（右）合影於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黨人中徐錫麟更是他的好友，就是因為此等淵源，蔡子民、馬敘倫諸人，都曾被延聘到翊忠學堂來擔任過教習，所以新思想的種子很早便已傳佈到翊忠來了。離學校不遠的地方，有俞曲園藏書處、大庵寺、石塔等名勝，是我小時遊蹤常到的地方。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我十四歲那年，五月廿六日（陽曆七月六日），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巡撫恩銘。在先，我幾乎因為馬宗漢先生的關係，而去安慶進徐錫麟的陸軍小學。如果那一次去了，一定會參加那一次的舉義，不知生死如何了，現在已無法想起是爲了什麼一件小原因沒有去安慶，也就失去了一次參加實際行動的機會了。討袁護國之役，吳仲懷老先生竟不顧北軍在蘇浙一帶勢力，毅然在諸暨號召舉義，可以想見此老風範。就在這種教育的環境裡，

我從小就接受到革命思想的濡染，立定了從軍報國的志願。當時浙東的小學除四書五經外，還要念地理、格致、英文、德文。由於我小學念九年，所以根基打得很好，對於以後的立身處世、修養志節，有了很大的幫助。光復的那一年（1912年）我十八歲，到杭州考進了學生軍，後來併到紹興大通陸軍學堂。

大通陸軍學堂的淵源：清末，浙江杭州設有都督府，都督府辦有一所陸軍中學，紹興設有分都督府，分都督府也辦一所陸軍中學。民元以後，紹興分都督府撤銷，紹興的陸軍中學也就與杭州的陸軍中學合併為一，改稱大通陸軍學堂。學堂的學員分為兩種，一是學員隊，學員隊的構成份子是民元時參加起義攻打南京天保城的浙軍幹部。清末軍隊中的下級軍官素質很低，有的識字很少，因此，把他們調到大通陸軍中學來受訓，帶職支八成薪。普通支隊長哨官等原來支四十元的，調訓時便支三十二元，待遇算是很優厚的了。另外一隊為學生隊，便是從學生軍考選的學員，我是考進去的，我們考進去的人素質比較好、也比較整齊，可是一個月只支七塊半錢。交去三塊錢的伙食費，剩下四塊半錢，由於當時的物價低，四塊半錢已經夠零用了，我一生所崇拜的李筱和師，就在隊裡教授軍事學，以後我還會談到他的事跡。

浙江獨立到護法

（民國元年至十二年，1912～1923）

陸軍學堂受業期限是三年，民國三年我從陸軍學堂結業，分發到浙江督軍署守備隊擔任第二連的少尉排長，這時我才二十一歲。到了杭州三年，由於接觸較多，知識大有增益，對於北洋軍

人之專橫跋扈，亦有所瞭解，所以對於革命或革新這一類的，有著熱忱的理想，在工作上也力爭上游。民國五年，升任中尉排長，那時浙江督軍是朱瑞，參謀長金華林，這兩個人都是北洋份子，他們對於總理所倡行的革命異常冷淡，有時甚至反對革命，是十足的官僚。我在守備隊時期，既對時局前途懷有理想，所以便交結了一班擔任下級幹部的朋友，準備將來共圖大業。他們也都是有抱負的熱血青年，其中和我最知己，浙江獨立助我最大者，為第三連的區排長，後於民國十九年死在杭州，壯志未酬，很是可惜。

民國五年，袁世凱帝制自為，朱瑞為迎合袁氏意旨，獻媚勸進，製造民意，擁護帝制。我們這一班熱血青年的低級幹部對於袁氏之倒行逆施，以及朱瑞的無恥諂媚行為，莫不義憤填膺，密謀驅逐朱瑞，浙江實行獨立，並聯合各省獨立推翻袁氏，共謀國是。那時我才二十三歲，已與張炯先生密取聯繫，張炯先生是革命先進王文慶先生派來浙江做聯絡工作的。我早就說通了下級帶兵官褚佐善等人在西湖密商舉義事項，把守備隊中不可靠的排長看管起來，以兩個排為起義的基幹，號召了守備隊大約有一個團的兵力，集中在城外報國寺和車站兩處，宣佈響應雲南護國軍，浙江獨立，聯合各省推翻帝制。（註：陳肇英先生在他紀念七十大慶的宏文上說他曾參與浙江獨立，其實他根本沒有參加西湖之會和舉兵事）。

當時浙江的兵力還有另外一個師、一個旅（童葆暄當時擔任旅長）、砲兵一連、警察一連、機關槍連一連。如果他們與我們對敵，我們是難以支持的。由於我們以大義相號召，他們對我們的行動深表同情，採取了觀望態度。朱瑞不太十分明瞭底細，以為

大勢已去，就偕同參謀長金華林夤夜乘坐小火輪逃走。浙軍旅長童葆暄乘機率部佔領督軍署，輕易的佔領杭州。童葆暄權任督軍，浙江繼雲南之後宣佈獨立，浙江獨立之後，東南震動，各省紛紛響應。袁氏莫可奈何取消洪憲，憂病而死，浙江獨立就是我以中尉排長策動的一件大事。

浙江的內部也是相當複雜的，大體上可以分爲三派，一爲南方派，一爲北洋派，一爲地方派。袁氏死後，北方政權仍然操縱在軍閥政客之手。民國六年，嘉湖鎮守使呂公望逐走巡按使屈映光，自爲都督，北洋政府後來又派楊善德爲浙江督軍。楊善德由上海率北洋的第四師一部入據杭州到任，呂公望出走，北洋派勢力復入浙江。我們這一班激進份子，在北洋勢力之下當然是難以存身。民國六年下半年，我離開杭州到廣東去參加護法政府。

民國七年元月，國父命李烈鈞先生擔任護法政府的參謀長，烈鈞先生敦請蔣百器先生任參謀次長，我因爲這種關係到參謀本部去擔任少校參謀。這時護法勢力侷處廣東一隅，連福建都在北洋勢力範圍之內，當時北洋政府派了李厚基爲「福建援粵軍」總司令，童葆暄爲副總司令，兼浙軍第一師師長，這是用來對付我們護法政府的。

我與童葆暄之間有一點歷史淵源，這一點歷史淵源是經過浙江革命先進王文慶先生的關係而建立的。原來文慶先生的胞兄王占慶先生是童葆暄在北洋速成學堂同學，又是海寧縣的小同鄉，因爲我常與王氏兄弟接觸，自然與童葆暄也就十分稔熟。護法政府因爲我有這種關係，就要我參加方聲濤的部隊，由廣東到閩南，目的想把暫投北洋的童葆暄說服過來參加護法。我道經廈門時，廈門還沒有繁榮起來，連馬路都還沒有，我們到閩南先委呂公望

先生去進行。這時王文慶先生的名義是「西南護法政府援閩浙軍副總司令」，我同時也掛了一個少校參謀的名義。說來很可笑，雙方政治上是對立的，私交上卻又如此親切。由於種種關係，我與童葆暄部隊中的人非常熟悉，我可以在他部隊裡走出走進，而了無嫌疑。可惜由於各懷私心，這一次我們前去運動的效果不大。後來又請出蔣百器先生出來活動，百器先生是革命前輩、名軍事學家，在東南尤其是浙江聲望很高，他當時的名義是閩浙宣慰使。他的活動也未收到全效，只把陳肇英一個團拉來，委派陳當第一師師長。^①陳此時才與委員長建立了關係，結盟為兄弟。後來陳任虎門要塞司令，因走私販毒被汪精衛逮捕，幾乎槍斃，從此陳肇英與委員長的關係便告疏遠。

這時委員長在福建長泰擔任粵軍第二支隊支隊長，有一次我隨王文慶先生道經長泰，委員長下帖子請文慶先生吃飯，連我們兩位隨員（另一位即區姓排長）也都請了。文慶先生從外面回來，看到了請帖，對我們說：「不要理他，這個人很難纏」，結果都沒有赴宴。由於我這幾年常在閩南與廣東往來，很自然的便與委員長^②接觸，因此而熟識起來。

-
- ① 毛思誠主編，《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不注出版時地），頁74，載「浙軍陳肇英歸誠，總理命擴編成混成旅，陳任旅長」此點待考。
- ② 委員長本來是追隨陳其美的，委員長少年時代很衝動，民元時，陳與當時名人陶成章不睦，陳與別人訴說陶成章是非時，委員長也在座，聽說之後溜出來把陶處決，等陳其美想制止時已來不及了，以後葬在西湖。北伐後我任寧波警察局局長時，委員長曾交下一個綽號叫「莫姥姥」的在我警察局吃閒飯，一天到晚罵大街，據說他就是委員長的一名打手。

民國七年上半年，桂系軍人在南方干涉政治，護法政府政治情況很不順利，福建的軍事也沒有一點進展。七年六月，桂系人竟改組了廣州的軍政府，易大元帥制爲七總裁合議制。桂系實力人物岑春煊也是七總裁之一，岑春煊在清代末年慈禧太后當政時代是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在西南有他的勢力，岑氏操縱下的政府對革命的情勢當然是不利的。八月間，國父取道汕頭赴日本轉上海，潛心著述。廣東局面完全爲桂系所把持，南方的革命勢力轉入低潮，我們在閩南也難以蹬下去，曾亡命到了上海。

民國九年秋天，陳炯明奉國父之命由福建的漳州揮軍討伐岑春煊，十月間光復廣州，陳氏受命擔任廣東省省長及粵軍總司令。十一月，國父由上海重到廣州。民國十年五月，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繼續討伐廣西的岑春煊、陸榮廷、沈鴻英等軍閥，規復了廣西。十二月設立大本營，任胡漢民爲大本營秘書長，李烈鈞爲參謀長，我由上海赴大本營任中校局員及上校參謀等職。

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在廣州舉兵叛變，圍攻總統府。這幾年，在革命的歷程真是一波三折。陳炯明本人並沒有危害總理生命的意圖，他打的口號是驅逐群小，陳炯明所指的群小是胡漢民、廖仲愷等人。在陳氏叛變前就已經把廖仲愷拘禁了兩個多月，可以想見陳炯明飛揚跋扈的情形。胡展堂固執耿介，自視甚高，脾氣大，愛罵人，得罪了很多人。陳炯明不滿於胡、廖等人，種下了叛變的根由。我爲什麼說陳炯明並沒有危害總理的意圖呢？因爲總理脫險時所乘的楚豫軍艦和永豐軍艦都在白鵝潭，白鵝潭全在陳炯明的控制之下，這一帶地理情況我非常熟悉，如果陳炯明要危害總理是十分方便的，怎麼能那樣容易的駛出白鵝潭呢？以後事情鬧大了，無法收拾，罪名都加到陳炯明身上。委員長當

時在上海，他由上海馳赴廣州護衛總理，真是認爲此仇此恨不共戴天，總理在廣州又無法立足，偕委員長乘英國軍艦赴上海。因爲這一次變起倉促，我離開廣州時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亡命到上海時，下身只穿一條短褲，可見其時狼狽情形。

民國十一年，許崇智由贛南規復福州，任討賊軍總司令，委員長任許崇智的參謀長，策動了滇軍楊希閔、桂軍、粵軍、劉震寰各軍討伐陳炯明，加上陳部中有人內應，陳氏勢難與許軍爲敵。該年十二月，陳炯明走惠州，許崇智、李烈鈞、朱培德等重佔廣州，總理於民國十二年二月由上海返回廣東復任大元帥之職，命委員長爲大元帥府參謀長，革命根據地逐漸奠定基礎。回顧這幾年，幾乎沒有一時安枕，革命的險境是內無兵力外無奧援，孤軍奮鬥，對於南方的大小軍閥真是一籌莫展。以後的聯俄容共、黃埔建軍，也就是在這種種不利的環境中激盪出來的。

黃埔·東征·北伐

(民國十三至十七年，1924~1928)

黃埔軍校是民國十三年五月正式成立的，起初是不分科別的(當時的雲南講武堂是分科的)，只是分成四個隊，學員有四百多人，大都是招來的，知識程度參差不齊，大都是對革命嚮往的青年抱著一腔報國的熱忱而來投考的。第二期雖然分科，但是物質條件貧乏，設備是十分簡陋的，戰馬和訓練用的大砲都沒有，騎科砲科沒有辦法從事實際訓練，雖然分科等於不分科。但是黃埔軍校很注重精神教育，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論和救國救民的道理的灌輸是十分注意的，這也許就是日後能夠發揮革命力量的偉大因

素之一。以我自己爲例，一出陸軍學堂便任少尉，以後在軍政府和護法政府時歷任到中校和上校參謀。但黃埔成立我卻擔任第二區隊的中尉區隊長，軍階上降低了這樣多而能心甘情願。革命時期計較這些個人的軍階是一件可恥之事，不愛名利這也許是黃埔精神之一。軍校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黨代表爲廖仲愷，軍校總教官是何應欽。另外，像汪精衛、胡漢民、邵元沖和總理等人也常到軍校來演講，當時政策是容共的，周恩來也在軍校講課，講的是「法國大革命史」。總理每一次講的都很長，令人疲倦。講得最好的要算汪精衛，他演講時，委員長都聚精會神的聽。把汪精衛的演說一字不遺的記下來，便是一篇好文章。我對汪氏的才華和風度一向很敬佩，後來他抗戰初期當了漢奸，我心中非常難過，很替他可惜，像這種書生，前半生有這樣的光榮歷史，爲什麼會鋌而走險走入到漢奸一途呢？蔣先生對他可說是可師可友的。至於胡漢民便是另一典型了，胡氏風骨凜然，見識高超，也是國父所重用的人才。我常常想，如果蔣、汪、胡三位先生能夠打破成見、通力合作，黨國的前途和命運不是這樣的，可惜以後鬧了多少的意見，黨內發生了多少次的裂痕，黨國的前途也遭受到不少的戕害。

國民黨當時的政策是容共的，黃埔軍校內當然有共產黨的活動。我以後才知道有什麼「革命軍人聯合會」、「孫文主義學會」等組織，其實那時除共產主義份子活動之外，也還有其他黨派的份子在軍校中，如無政府主義等。以後當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李良榮氏就是因爲在黃埔積極從事無政府主義的活動而被開除的。廣州的國民政府聯俄容共，有俄國顧問；黃埔軍校也有俄國顧問，駐軍校的是一位蔡顧問，夫婦兩人都當顧問。以後我東征當團長

時，蔡太太就在我團裡當顧問，她會修理機械，身上有許多疤痕，都是俄國大革命時代負的槍傷，傳說張靜愚和繆斌都曾和她有染。抗戰初期中蘇復交，聽說蔡顧問夫婦重又來華，可是我因戎馬倥傯，始終未見到他們。

民國十四年三月間，廣州積極的從事東征工作，動員部隊連黃埔的學生軍都調去會同粵軍去討伐陳炯明了，這對黃埔教育而言，不啻是一次實彈演習。軍校學生軍編成了教導第一團和教導第二團，何應欽任教導第一團團長，繆斌是第一團的黨代表。提起這個繆斌，就是以後當漢奸、抗戰末期又冒充重慶代表到日本去談和、勝利後被槍斃的繆斌。他是無錫人，小有才幹。我就在教一團任第一營營長。編制是三三制，一團三營，一營三連，一連三排，一排三班。東征時打了不少次的戰役，俄國的顧問真的和我們一道打衝鋒。棉湖之役，戰況非常慘烈，攻城時我身先士卒，身負重傷，子彈貫穿了我的左胸，還好我的族叔——時任旅部參謀長——派兵把我搶下火線，療養了半年才好，直到今天天氣不好時，傷口還隱隱作痛。東征之役是一次艱苦的作戰，陳炯明在廣東有他深厚的勢力，同時也有外援，我們能以數量不多的軍隊蕩平粵東反革命的老巢，實在不容易。不掃平粵東，我們是沒有辦法北伐的。粵東平定了，廣州的革命根據地才安如磐石。我傷癒之後，調升為第一團中校副團長。

我們東征之後統一了廣東，這時廣東的老百姓對我們革命軍還是沒有太多的認識，更不知三民主義和革命為何物。本來我國民智低落，何況黨在那時沒有積極的從事民運工作。不過這時我們的軍紀優良，不擾民，比軍閥的部隊好，這是廣東的老百姓所共知的。這就要歸功到黨軍的本質和黨代表制的施行，使東征北

伐軍中甚至連士兵都能知道愛護百姓，做到了買賣公平。黃埔時的黨代表制度與今日之政工制度略有不同，黃埔畢業生優秀一點的學生，大部份分發擔任黨代表，另外的擔任連長，黃埔軍校並沒有設立特別的班級來訓練黨代表。他們分發到連之後，連長與黨代表都是同學、同事，所以能夠合作無間，不像現在的陸軍官校是與政工幹校分開，各有不同的出身，在一起共事，難免存有隔閡。這件事我曾與經國先生談過，提醒他的注意，設法改善。剛才講過，我們的軍紀好，表現在買賣公平，不住民房，萬一住了民房，臨走時一定打掃得比沒住時更乾淨，借物一定歸還，絕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所以東征北伐時，老百姓對革命軍瞭解之後，都央請我們去住，都自動替我們當伕子，送我們一天路程，甚至村婦都替我們當伕子，與我們弟兄一起睡地舖而不會出亂子。可以想見東征北伐時代革命軍人的純潔，真是有一股清新的氣象，才創造出北伐成功的局面，不像後來湯恩伯的部隊在河南燒殺淫擄，無惡不作，到了這一步，革命軍已成了老百姓攻打的對象，天下怎能不垮。

民國十五年時，我已升任第一軍第五團的團長，這一團是優秀的一團，也是純潔的一團。那時因為容共軍隊中都有共產黨份子滲透進來，我這一團只有第一營營長是一個共產黨，就連這一個共產黨以後還在德智門作戰陣亡了。此時革命軍主力大部分駐防在汕頭和東江一帶，駐在廣州城區的只有第四團、第五團和第六團。第四團幾乎清一色是共產黨，團長是陳繼承，這一團的思想最不可靠，當時駐在廣州的俄國顧問鮑羅廷和季山嘉這班人是反對國民黨北伐的，原來他們是另有陰謀，他們在北方發展了共產黨的組織，在西北軍中潛伏活動，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要等到北

方黃河流域赤化了再北伐，這樣可收夾擊之效，獨佔革命成果。國民黨的內部意見也是十分分歧的，這些時候政治上也發生了很多的波瀾，像廖仲愷的被刺，胡漢民的逐放赴俄，都是黨內的不幸事件。大概北伐先後的問題是三月二十事件的背後原因，至於那一次事件，我可以把我親眼所見到的事大略的說一下，事實的真相則不太清楚。

大約是三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因事到蔣委員長那裡去，親眼見到他正在寫信給汪精衛，在場的好像只有陳立夫一個人，那時陳很年輕，儀表很好，好像是擔任侍從秘書之類的工作，我還不太認識他。信中的大意我都看到了，大概是：「季新先生：總理容共政策，弟始終擁護……而今黨危矣，國危矣……」這封信撕了又寫，寫了又撕，寫撕了很多次都還沒有寫成，究竟這封信寫好沒有，是不是送給了汪精衛，則不得而知。本來委員長不想自己出面做，想叫別人出面做，由他出來收拾殘局，但是，後來還是自己出面做了，想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究竟共產黨在那時是想要弄什麼陰謀，各種說法很多，但多是猜測之詞，直到現在完全瞭解真相的，並不太多。

當時我這一團住在廣州的北校場，第四團住在沙岸，第六團另住一處。第四團中共產黨份子最多，所以目標首先要解除第四團的武裝。用武力解除一個團的武裝，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驚動地方，還要流血，所以只有智取。我冒了校長之名，命令第四團徒手到我的防地北校場來集合聽訓，他們並不疑有他，全體開來。我另外派了一營的兵力把第四團的武器全都收繳過來，這樣未有一點驚動、未流一滴血，順利的解決了第四團的武裝。

當時共產黨操縱下的廣州工人組織嚴密，時常舉行十幾萬人